

方言 2020 年第 1 期 1—4 页 (2020 年 2 月 24 日出版于北京)

怀念李荣先生

——纪念李荣先生百年诞辰

贺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hewei1501@sina.com)

李荣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很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在工作中,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关心青年人的成长,为方言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学风,他勇于承担责任的开拓精神,他不屈服于各种压力的坚强意志,他维护国家尊严和学术尊严的勇气,他大力推进方言事业发展的良苦用心,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创办的《方言》季刊,他主持成立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本学科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的方言研究水平和国际学术地位。当我们回顾这些往事时,很自然地会想到李荣先生在方言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

李荣先生聪慧自强,中西并重,观古论今,视野开阔,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对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在贯彻国家语言规划方面,他所提出的重大研究课题,和对一些问题的分析认识,都有启示作用和指导作用,至今在方言学界仍有重要影响。下面回忆李荣先生的几段往事,以作百年诞辰纪念。

壹 创办《方言》季刊

《方言》创刊是李荣先生一手主导的。李荣先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语言所刚恢复办公的时候,就开始筹备创办《方言》了。因为我们过去印方言著作非常困难,只有在科学出版社才可以排印。排印方言著作,一是要用国际音标,再是要用调号,排印起来非常麻烦。科学出版社的国际音标符号,不标准也不齐全。李先生觉得非解决这个排版难的问题不可。再是从方言研究方面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刊物,这门学科很难发展。基于这种认识,在这之前,李荣先生就有想办一个方言刊物的想法,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要办这个刊物非常困难。首先得解决国际音标的问题,然后得解决排版印刷的地方。国际音标加上排方言的特殊调号,得重新设计,重新制作,在北京没有制作的地方,工厂排印的是铅字,制成铅字得先有铜模。北京有个新华字模厂,李荣先生让我去那儿看看,他们能制作国际音标铜模不能。当时的工厂制作这类铜模,是既无设备,也无人力。此后李先生通过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胡惠贞跟上海字模厂联系,把希望寄托到上海,希望能在那里制作。在上海制作,需要一批经费,经所里研究同意,我带着李先生设计的制作音标字模样稿,到当地和上海字模厂联系。他们的设备较好,也有制作字模的人员,有能力制作。厂里提出了一些制作条件,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愿意先做一些样品试试。在双方的协作下,我们室的熊正辉和其他人员曾先后到上海催促制作,查看制作样稿。在李荣先生的指导下,经过多次反复,上海字模厂终于制作出来了方言排版所需要的一套国际音标铜模和一套汉语方言调号铜模,为《方言》创刊打开了一条通路。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找印刷厂排印。在北京找能印刷方言的工厂非常困难。李荣先生想起北京的新华印刷厂

里有一个车间,是从原来的京华印刷厂合并过来的,这个车间当年是排印《中国语文》的,也给李先生排印过《语音常识》这本书,其中有技术工人能排版。李先生跟一个叫曾茂公的比较熟悉,此人当时任排版车间主任,设法跟他联系之后,他提出了排版工人不认识国际音标的难题。李先生为此多次下车间了解情况,和排版人员商议,以数字标注音标的方法,为排版工人设计了一套音标检字编码序号模板(见《方言》1979年第2期),解决了工人排版检字难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1977年成立的,经胡乔木院长批准,《方言》于1979年2月24日正式出版。《方言》是季刊,每期80面,约12万字。第一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李荣的《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第二篇是叶祥苓的《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这两篇文章就把一个期刊差不多占满了,这就打破了过去常规,一个刊物怎么就登两三篇文章、三四篇文章呢?更与众不同的是,本刊还用英文发表国外语言学者的文章。李先生大胆尝试,敢于从形式到内容改革创新。

《方言》创刊以后,方言的连读变调成为讨论热点。我们可以翻看1979年至1982年《方言》里登载的文章,讨论的大都是有关连读变调的。这是方言研究的新课题,引起了国内外方言学者的注意。叶祥苓的那篇苏州的连读变调文章,引起了吴方言区与此有关的热烈争论。随后官话方言、吴方言、闽方言、湘方言、晋方言等的连读变调的文章不断涌现,掀起了连读变调研究的新高潮。从连读变调方面,提供了语音构造的新事实,创新了语音系统的新理论,给全国各地的方言研究带来了一股新活力。

贰 开创中澳合作交流

全国汉语方言普查之后的最终成果,是绘制出汉语方言分区图,这是我们方言研究室的一项重要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方言》创刊之后,正逢改革开放之时,把汉语方言分区图的课题列入国家规划,是我们的愿望。要完成这个任务,仍有许多困难。一是调查制作经费有限,二是无先进的绘图技术。这个期间语言所的国际学术交流频繁,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的学者纷纷来所访问。有一次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人文学院的学者,其中一位英籍华人教授邹嘉彦,在该校任教,还有一位是该院副院长兼语言学系主任教授温棣帆(S. A. Wurm),他还是联合国科教组成员。访谈时他们说,他们正在规划的项目是太平洋地区语言分布图,准备向联合国申报。这个项目和汉藏语系有关,李荣先生考虑,如果能把我们的项目列入其中,双方合作,可以解决我们许多难题。他跟温棣帆交谈时,说了我们的想法,温棣帆和邹嘉彦听了都非常感兴趣。他们觉得把中国汉语方言地图列入其中,可以增强和丰富其课题分量,也便于请语言所协助完成其项目中的太平洋地区华侨语言分布图。语系相关,项目相合,他们表示有合作意向。澳方提出来,如参加他们的项目,我们有什么优势?李先生指出:第一,绘制汉语分区图,我们有全国汉语方言普查的资料,不足的可以补充调查。第二,方言研究室的全部人员可参加这项工作,还可以组织高校的力量开展这项工作。第三,这个项目已列入国家六五规划,全部工作准备用五年时间完成。

为了落实这个意向,澳方提出请方言室试做一些草图。在此之前,室内的熊正辉对计算机有研究,通过他设定的程序已编制出了一幅汉语方言分区简图,登在《方言》上。为了落实到地区,李先生让我编绘了一幅中原官话草图作样品。当时对中原官话已着手调查,依据部分资料,设定体例,编绘了一幅中原官话草图,并用彩色分出区片。温棣帆跟邹嘉彦看到利用计算机编制的语言地图和中原官话的分区图之后,觉得方言室搞这个项目有条件,一是计算机绘图可用,二是绘制的草图,能显示汉语方言分区状况。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明确了各自所承担的任务,初步把这个合作项目定了下来。澳方回去需修改规划,增加预算,我们需要向院里和有

关部门申请报批。后来民族所加入,负责编绘民族语言部分。在多方的努力下,1983年经社科院批准,以《中国语言地图集》名称,中方和澳方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我们编好的地图稿,都需要及时交付澳方制作,也需要到澳大利亚作校对修改工作。协议书中有一项规定,中方在三年之内,每年可派若干研究人员赴澳参与地图的修改校对工作。当时认为这是出国学习访问的良机,鼓舞了大家的热情,增强了信心。为了让方言室的年轻人增长才干,开阔眼界,李荣先生作为课题的负责人先后分期分批派出熊正辉、贺巍、张振兴、黄雪贞等十多人到澳大利亚访问,而他自己却放弃出国的机会。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这样做,是十分罕见的。我们能到澳大利亚访问,参观了他们制图的全过程,确实受益匪浅。这为后来的第二版《中国语言地图集》的设计编绘制作,提供了经验和技術支撑,为顺利完成这项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李荣先生的主导下,汉语方言分区图的全部工作于1987年基本结束。中澳合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于1987年在香港朗文出版。至此我们所承担的国家的六五规划项目顺利完成,实现了我们的愿望。

叁 成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 树立务实会风

汉语方言学会成立于1981年(1995年改为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学会要办成什么样子?树立什么样的会风?这是李荣先生反复考虑和筹划的问题。他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说明了他的一些想法。

一、让年轻人当理事,干实事。从组织机构来说,就是要选出一些精干的职员(理事)为大家服务。李荣先生说:“我们成立汉语方言学会的目的就是推动方言研究,我们的组织机构就得适应我们的目的。这个组织机构是干什么的呢?是为会员服务的,不是来管理会员的,不是做官的,是干活的。因此就应该挑一些精干的人(理事)出来。”李荣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成立的很多学会,其组织机构重叠,各种职衔,名单列了一大串,真正办事的人却不多。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会议开始,他就提出来他的主张:“我们的机构是办事的,人手必须精力旺盛,必须精干。(理事)名单不宜乎太长。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职员(理事)少一点,工作就会做的更好一点。”在他的主导下,汉语方言学会的首届理事会,是经过大家的广泛讨论选举产生的,有以下的特点:一是不设会长、副会长;二是理事会的人员分布在各个地区,大都由中青年担任;三是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理事会人员的所在地轮流举办。

汉语方言学会的这种组织形式,层次少,责任明确,办事效率高,符合当时的实际。此后召开的各届年会,都很成功,大大推动了方言事业的全面发展。纳入了民政部管理之后,虽然设立了会长和秘书长,但仍然层次少,办事效率高,保持原学会本色,是最有活力的一个学术团体。

二、要团结协作,互相帮助。会员是学会的基础。会员和会员,会员和理事,必须团结协作,才能把学会办好。李荣先生对此非常关心。他说:“要做好方言工作,必须搞好团结关系。”当时各个学校,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一些问题。一是人员之间矛盾较多。在方言工作者的队伍里,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尽量避免把这种情况带到方言学会中来,李荣先生及早提出了预防措施。二是在方言调查的工作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学校认为本地的方言只能由本地区调查,不高兴其他学校或其他地区前来开展方言调查工作,由此引起了一些矛盾。李荣先生为此说:“方言调查不能画地为牢,说这一块是我的。我们的汉语有多大面积啊,不要认为我研究了,别人就不能再研究了。”三是门户之见引起的一些问题。在社会上可以看到,学校和学校,老师和老师,资历不同,传授的教师不同,形成了门户之见。李荣先生说:“学问是接力棒,徒弟在老师的歇脚点起步,加上自己的钻研后来居上,徒弟应该比老师强,要

是这一辈的徒弟比这一辈老师弱,那下一辈徒弟又比下一辈的老师弱,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李荣先生是希望大家开诚布公讨论问题,不要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抬高老师标榜自己,抬高自己。方言学会的会员来自全国各地,由于地区不同,所接受的方言调查知识不同,其差别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不能坚持己见,找出各种理由,打出各种旗号,削弱或影响学会会员之间的团结协作。这是李荣先生特别强调的。

三、从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方言学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组织全国的方言工作者,认真开展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李荣先生说:“方言的研究就是语言的研究,研究方法大同小异,没有根本的差别。自其同者而视之,研究语言要研究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研究方言也要研究这些方面,这是从研究的范围说的。”从调查的方法来说,脱离实际调查出来的结果,对语言研究不但没有用,反而会有很多害处。李荣先生指出:历史上有些地方韵书,是照别的韵书抄下来的,给后人的研究工作添了许多麻烦。李荣先生反复告诉大家:方言调查就得实地调查,实地记录,认真分析,认真研究。调查要反映实际,研究要打开思路,不能拿自己的印象,去替代调查研究。他还特别指出:研究方言着重口头说的,最好从自己的方言入手,这样做事半功倍。

四、开展学术讨论,提高研究水平。李荣先生说:“研究方言跟研究其他学问一样,独学无友,不容易进步。切磋琢磨,互相提意见,学问才能进步。”开展学术讨论,可以采取不限题目的方式,大家准备好论文宣读,各言尔志,你讲什么,我们讨论什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事先选定一个题目,大家分头准备,讨论同一个题目。我们组织讨论会,不管是哪种方式,都要求有不同意见互相交换。不要搞得讨论起来众口一词,法说雷同,方言学会不能开这样的会。

我们开年会和专题讨论会时,李荣先生提出五条注意事项:一是要避免互相攻击。二是宣读论文要开门见山,讨论要就事论事。不同的意见就说不同,相同的意见就说相同。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我们的学问就能进步。三是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为我们每个人看问题都有片面性有局限性,大家互相配合,学问才能研究好。四是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要容得起别人的批评。五是提倡有什么说什么,序跋少加。我们讨论会最好直来直往地发言,针锋相对地讨论。李荣先生提出的这几条意见,非常有针对性,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大家共同遵循,并逐渐成为开学术讨论会时的会风。

肆 结语

我们纪念李荣先生,想起了许多往事。除了上面说的之外,李荣先生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重要建树,比如:在音韵研究方面,李荣先生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清晰地系统地构建了《切韵》音系,在国内外受到好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语法研究方面,李荣先生以独到的理解,结合北京话的语言实际,编译了赵元任的《北京话口语语法》,使读者为之耳目一新。在语法研究处于开创时期,他和丁声树、吕叔湘一起在《中国语文》上连续发表《语法讲话》十七讲,其中有不少重要章节由他撰写,为系统地建立汉语语法的构造框架,为开辟语法研究的新途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汉语方言分区方面,依据各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的主要特征,把汉语方言分为十大方言区,其中的官话方言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方言的一致性较强,是分区的难点。李荣先生依据古入声次浊字在各地的演变情况,把官话方言分为八个方言区,解决了官话方言分区的难点,推动了汉语方言分区的研究。此外,在汉语方言连读变调、变音、考本字、汉语方言词典编纂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论述,为汉语方言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聚焦新视野的研究方法。现在在纪念李荣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应当继续发扬传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敢于开拓创新,把汉语方言研究推向新的高峰。